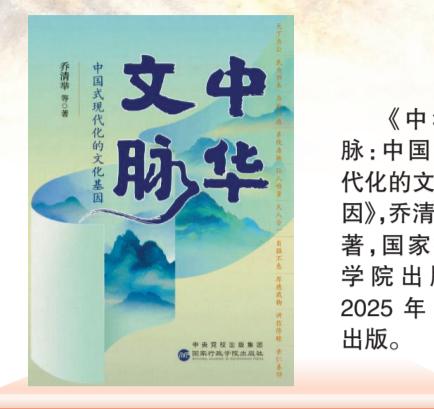


# 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底色与人文根基

刘金祥



《中华文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乔清举等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

在现代化大潮浪飞涛卷全球的当今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特的文明底蕴与文化逻辑,成为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由中央党校乔清举教授等人撰写的《中华文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以下简称《中华文脉》)一书,宛若一把精巧别致的钥匙,开启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文化密码。《中华文脉》不仅是一部扎实厚重的学术著作,更是一曲书写文明传承与文化创新的绚丽诗篇,它以深彻的学理分析和诗意的文化叙事,向读者展示了中华文明如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底色与人文根基。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点和独特优势。中华文明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惊人的历史连续性与强烈的文化韧性。乔清举教授敏锐地捕捉和剖解这一特质,并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突出位置,重点阐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角色及其重大意义。《中华文脉》一书揭示的不仅是历史事实的传承与延续,更是一种文明意识的流布与弘扬——那种“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自我更新能力。这种自我更新能力使中华文明在保持自身统一性的同时,不断吸收、转化、融合外来文化元素,逐步实现创造性的自我超越。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否定,而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种有着五千年文明根基的现代性探索。

《中华文脉》一书最为精彩的论述之一,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诠释。作者没有停留在对这一概念的古典解释上,而是深入挖掘其现代生态意义和精辟阐释其当代价值启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与人并非主客二分的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生成的有机整体。这种宇宙观孕育出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伦理,而非征服自然的掠夺伦理。当全球面临生态危机和现代性困境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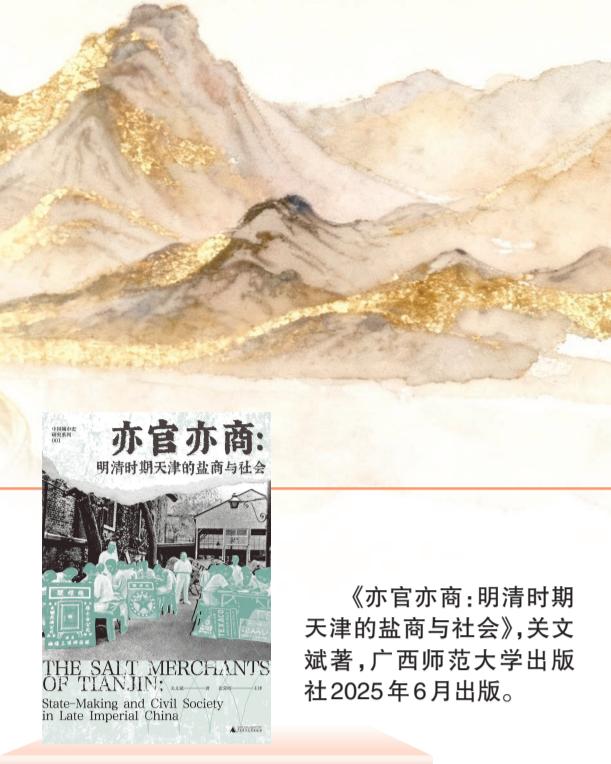
性的现代化方案——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道路。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路径的调整,更是一种文明范式的转变,是对现代化体系的文化重构。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个文化基因是“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与“民为邦本”的治理智慧。作者以精湛的学术笔触和精到的语言表述,清晰勾勒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转化为现代治理资源的历史过程。“民为邦本”则将焦点放在人民的主体地位上,提醒人们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不应忽视民众的基本诉求。作者深入剖析了这一文化理念在政策制定与运作执行中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广大群众的参与和反馈对政策的实际效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探讨“为政以德”的部分,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案例来说明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中的不可或缺,通过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解读了历史人物和事件。这种叙事方式既发掘了历史的深度,又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使得读者能够领会到历史不仅是过去,更是现在生活的指引与指南。该书认为与西方基于个体权利的政治话语不同,中国传统强调社会的和谐与整体的福祉,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不是对个体的压抑,而是个体与集体的辩证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种文化基因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承接。这种承接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通过现代政治理念对传统资源进行过滤、提纯和升华,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现代政治文明形态。

《中华文脉》对“中庸之道”的现代诠释尤为深刻和透彻,作者指出,中庸不是平庸,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智慧,一种把握分寸的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种智慧表现为对各种矛盾关系的辩证处理——传统与现代、改革与稳定、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自主与开放。这些看似对立的概念与范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往往能够找到平衡点和结合点,形成一种充满弹性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是预先设计的结果,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调试而形成的“中国智慧”,它体现了中国化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中华文脉》最为动人的地方,是它揭示了中国人面对现代化时葆有深刻的文化乡愁,作者明确指出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传统与现代的张力,这种张力在中国语境中表现得尤为复杂。一方面是对现代性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对传统的眷恋;一方面是向前看的冲动,另一方面是向后的乡愁,作者在以诗意图描绘这种文化心理的辩证运动的同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寻找前行的动力,换言之,传统文化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是现代化的资源;现代化不是传统的断裂,而是传统的延续。这种辩证认识打破了过去那种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加开阔的思路和多维的视角。

在全球化波谲云诡的今天,各种文明交流互鉴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华文脉》一书主张中国式现代化不是闭关自守的现代化,而是开放包容的现代化。中华文化本身就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历史上不断吸收外来文明成果并加以消化创新。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中,这种文化气质更加凸显其时代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既坚持自身文化主体性,又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这种开放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正是中华文脉的生命力所在。《中华文脉》一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学术深度,更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视角,即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科技的进步、制度的变革,更是一种文化的创新和文明的转型。作者通过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的内在关联,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承载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如何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如何实现着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这种文化视角超越了单纯的技术经济分析,使人们对国式现代化的理解更加全面、更加深刻。

阅读《中华文脉》一书,我们似乎听到了一场跨越五千年的文明对话,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在这场对话中交织共鸣。该书作者以学人的严谨和诗人的情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图景,这幅图景不仅引导人们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启示人们思考人类文明的未来。该书告诉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不是沉重的包袱,而是轻盈的翅膀;不是前进的阻力,而是创新的动力。中华文明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从远古流向现代,从中国流向世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为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关文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如果不是闻名后世的辛亥革命,1911年或许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年份,但对曾经如日中天的长芦盐商而言,则像是从天堂跌入地狱。这年的7月17日,长芦盐商王贤宾、李宝恒两家被抄。当天晚些时候,长芦盐运使张镇芳“满意地视察了王家和李家的家产和已腾空的宅邸”。就此,本书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关文斌写道,“就在王贤宾和其他累商被抄家五个月后,武昌起义爆发”。

食盐专卖在中华历史上由来已久,从春秋管仲创立盐业专营制度,至晚清已2600多年。理论上食盐并非稀缺之物,历朝历代之所以紧抓不放,关键在于可观的税收。及至晚清,官盐营制度日臻完善,当然这也意味着官府对盐税愈加依赖。本书中,关文斌之所以聚焦天津长芦盐商,既因史料充盈,更因天津曾经只是一个普通的军事卫所,漕运特别是长芦盐商的迅猛发展,加之与京畿邻近、政治关系密切等原因,甚至可以说,“一部长芦盐商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天津的发展史”。

在关文斌看来,天津的地理优势无可替代。一方面,京杭大运河经天津,是古今漕运重要通道;另一方面,天津是海外客商登陆的重要港口。有清一代,为了让舵工船夫们“稍沾余息”,朝廷许可他们在漕运同时携带免税物资,这一“恩策”间接促进了当地的贸易。当然,长芦盐商的发展还有着难以比拟的优势,关文斌指出,“芦商的鼎盛与漕室通过内务府借贷和国家机构‘发商生息’而获利大量经营资金不无关系”。在清帝国的强大背景和资金双重加持下,长芦盐商的发展自然底气十足。

对于芦商收益,朝廷焉能不知?晚清盐商除了“被迫承担至少185项名目繁多的税收和费用”,私下大量行贿官员外,还会投之以李、报之以桃,如“恭进捐输报效”,主动上交大笔利润替朝廷分忧。据不完全统计,“从1799年到清末,芦商有案可查的捐输超过300万两白银”。

关文斌并不认为盐商真就高风亮节。有时盐商自以为聪明,以“捐输报效”之名,试图变相推高盐价。盐商的骚操作有时或略有收获,有时则会踢到铁板上。乾隆就曾对盐商以助饷“应付金川之役的军费”建议而龙颜大怒。有的明面上对官府极尽谄媚之能事,私底下却贪得无厌,如在秤砣上动手脚,偷逃或少缴税款。还如“掺土以增加重量”,“胆大的更添加沙石、石膏和明矾”,弄虚作假,坑蒙拐骗。至于私盐泛滥则是公开的秘密。曾有学者研究后估计,中国历朝历代私盐从未得到根治,数量至少占流通领域的一半。

尽管盐商“在家族资财的控制、分配和管理中,家庭成员间周期性地爆发危机”,个别极端情况下的矛盾甚至难以调和,但在大多数时候,盐商会依托家族纽带和各种人脉,构建起一张庞大的关系网络。毫无疑问,财富是盐商追求的目标,但经常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盐商同时又深深感到,“富而无权是危险的”,为此,盐商穷尽努力接近官员,甚至皇帝身边的侍从,以求自保。

除了贡献税收和“捐输报效”,长芦盐商还“填补了政府不愿或不能填补的空白”。而当官府身陷困境时,他们往往会成为社会矛盾的转嫁对象,其结果如王贤宾和其他累商,最终落得个被抄家的凄惨结局。盐商与官府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时局稳、经济顺畅之时,盐商与官府间的互动常能维持基本的平衡。或许意识到这种平衡的脆弱性,盐商试图以种种方式影响或进入体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结果却遭到传统官僚本能的阻拦乃至打压。在一个权责界限不清、法治混乱无章的时代,盐商终究无法摆脱被支配的命运。

## 盐商与官府的互动与支配

禾刀

## 穿越时空的震撼

戴荣里

梳着双辫子的女儿,情态可掬,犹如现代女性。我看到了鹿、羊、鸟、猕猴和野猪,也看到了红毛狗、兔子、天鹅和飞鸟。古代画家对这些动物的捕捉,竟然能把动物进行拟人化的表达,看后顿生无限爱意;敦煌油画还表现了众多乐器,除了乐伎持乐器表演,更多的是显示乐器的静物,那不弹而鸣的气场,有人伴着乐器起舞,线条流畅,那个静止在一旁的乐器,就像在发出悠远的乐音。古人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统一性的把握,会让现代画家自叹弗如。

与我一同欣赏画册的傅教授,十分喜欢观看古人的胡须,那些被画成门帘一样的胡须,显然是古代画家写意的表达手法,在众多留着胡须的人物中间,人物的尊卑地位,一目了然;在一幅僧人剃度的画幅中,能明显看出那些削发为僧者的意志坚定。敦煌壁画善于把握人物的面部细节和行为举止,一个玩木偶的女子,举着呼喊的孩子,表情夸张而又恰到好处,无论是对禅者的刻画,还是对市井生活的描写,画师的细心体察,构成了静中有动、欲说还休的画面语言,一幅画,堪称一篇哲理文章;几个人物,完全可以构思成具有无限韵味的现代小说。这些画面和现代人没有一点阻滞感,相反,画面之柔美和线条之丝滑,让你顿感古代画家们刚刚完成自己的佳作,正在一旁陪着你静静欣赏。

对自然风光的刻画,也能看出古代画师们的贡献。在敦煌,这些躲藏在石窟里的山水造型,同样可以震撼你的心灵。和完全写实的山水画不同,敦煌的山水画作,具有明显的装饰性,无论是一棵树、一朵花、一座山、一处田园,画师

想用简洁的语言描绘复杂的情感,在具有明显装饰意味的画作里,你能感受到自然的唯美。人物、花鸟与自然界的一切,融为一体,在虚幻与真实之间,在人间和圣境的对比之中,在世俗与空灵的选择里,古代画家清晰地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意愿。诚然,自隋朝至唐朝然后五代和宋元的沿袭脉络里,画作的变化越来越不单纯,以至于到了宋代,青色的理性代替了隋朝的欢快,到了元代,繁复的画面更让读者感受到复杂的意味,人类渐渐脱离了单纯,复杂的头脑,缺少了自由创新的欢快,表达内容的晦涩,寡淡掉柔美线条的美感。各个朝代敦煌壁画的不同表达,也在折射着各个时代的文化的走向。

一上午的时间,我在中国佛学院图书馆里静静地翻阅完这本画册,《最美敦煌》这本书,是当代画师们临摹经典的佳作。或许,那些有着西方油画技巧的现代艺术家们,在描摹敦煌壁画时融进了所谓现代技法。但我想,日复一日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已经让他们感受到了华夏艺术家祖先的奇功,这是古代与现代的对话,书写着艺术血脉的流转。按常规,我会在图书馆里做出六七页的笔记,但那些唯美的画面推动着我向前翻阅,等我把厚厚的一本书翻阅完毕,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洗礼。我的笔记本上没有记下一个字,那些画面,却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

敦煌之美,大哉!它是穿越时空的经典,那些带有艺术通感的画面,震撼着我。感谢现代艺术家们,把石窟里的佳作变成案头的读物。

(作者为科技哲学博士、中国作协会员)

